

汉语研究存稿

郭锡良 著

中华书局

汉语研究存稿

郭锡良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研究存稿/郭锡良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7.1
ISBN 978-7-101-12356-2

I. 汉… II. 郭… III. 古汉语-研究 IV. H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8994号

-
- | | |
|------|---|
| 书 名 | 汉语研究存稿 |
| 著 者 | 郭锡良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
201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¼ 插页2 字数430千字 |
| 印 数 | 1-1500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2356-2 |
| 定 价 | 68.00元 |
-

序 言

我从 1954 年到北京大学作汉语史研究生,进入汉语研究领域,至今已经一个花甲。我的学术研究活动主要是在古代汉语教材、汉语语法史、汉语古音学方面。但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教学需要,我不只教过汉语史、古代汉语、文字学、《马氏文通》研读、段注《说文解字》研读、古代语言学论文选读、汉语语法史研究,出版过《古代汉语》《古代汉语语法讲稿》《汉字知识》《汉字古音手册》等著作;也参加过《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8),教过“语法修辞逻辑”课,编选了“20 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中的《王力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调查过方言,写过有关湘方言的文章;还带领汉语专业 72 级学生编选、注释过《柳宗元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二十年前承商务印书馆为我出版了《汉语史论集》,十年前又出版了增补本,《论集》只收录汉语史方面的文章。前年我收集了部分其他方面的文章,中华书局秦淑华编审看到了,促成我另编一个集子,并建议叫做《汉语研究存稿》,去年就把已经收集的文章排印出来了。这让我不得不把没有完稿的《衡山望峰话音系》赶写出来,并收齐其他文稿进行编定。《存稿》收集长短不一的文稿 56 篇,据内容大致分成五类。

第一类是有关古代汉语教材、教学的文章 12 篇。1961 年文科教材会议后,我参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的编写,三四年之间,全力以赴,执笔写了《绪论》和音韵、文体方面的通论 9 节、附录 5 节。这是我继续在王力先生指导下完成学术研究的重要锻

炼过程。每写一节通论,我必须查阅古今有关资料,先写出提纲,反复推敲,写成初稿,交编写组提意见,由王力先生最后审定、退改。这比个人写几篇文章在刊物上发表难得多,得到的锻炼、提高也大得多。《存稿》选收了通论《骈体文的构成》上、下两节,这是在收集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唐文粹》《四六法海》《骈体文钞》和今人研究骈体文的相关资料后写成的(读研究生时,曾准备写这方面的论文)。教材的《通论》部分被译成日文出版,书名《中国古典读法通论》(日本朋友书店 1992)。这里选两节,以见我所写通论的一般情况。

“文革”后期招收了工农兵学员,由我负责古代汉语教学小组。为了当时的教学需要,我以编写古代汉语教材为由,招收了五个进修生,想法摆脱军工宣队的约束,开门办学,到校外去上课、编教材。“文革”中编出了上、中两册初稿,以应付教学;“文革”后编出下册;1979年起分册定稿发排,1981、1982、1983年先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本世纪初由商务印书馆改为上、下两册出版)。

“文革”动乱,极左路线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当时不少人无气,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我只得个人多干点。全书 29 节常识,主要由我执笔的就有 21 节(上册有些初稿是由进修生、年轻教师提供的);六节词义分析举例,也有一半以上是由我执笔。这里选了一节常识《古汉语今译问题》、一节词义分析举例《同义词辨析十五例》,以表达我这个时期在教材、教学上所作的努力。全书的常识部分去年已被译成韩文,即将在韩国出版。

80 年代我担任了中央电大的主讲教师,讲课外还应各地电大教学刊物的要求写了十多篇辅导性质的文章,这里选了六篇。当时有关方面曾建议我收集四个主讲教师的文章,出版过《怎样学好古代汉语》(语文出版社 1986)。至于《参编〈古代汉语〉的体会》一文,则是 1987 年我在首届全国优秀教材授奖仪式上代表去世的

王力先生领取了特等奖之后,应邀撰写的个人心得,表达了当时学术界对文科教材的肯定态度。

第二类是有关湘方言的文章 5 篇。上世纪 50 年代我作研究生期间,选修了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概论”,曾两次随班去山西进行方言调查实习,“文革”中又随 72 级到韶山进行过一次方言调查。我虽然知道方言调查对研究语言学的重要性,但是“文革”前忙于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和汉语史教学,确实抽不出时间兼顾方言,可以说方言研究成了我的弱项。八、九十年代就有意带研究生回衡山调查了三次方言,写了几篇文章;最后又将我 50 年代记录自己方言的字表结合这几次的调查资料,多年前已整理出音系。这次花了大半年时间,探讨了望峰话音系的发展变化,写成《衡山望峰话音系》。

这一实践使我真正认识到深入研究自己方言的重要作用,后悔这个工作做得太晚了。以前总以为自己出生在口音混杂的洞庭湖湖垵,口音能否代表祖籍的方音,不敢自信。现在看来,我四岁后就跟祖父读了四五年古书,接着在衡山老家生活了十一年。我的口音虽有混杂的一面,可是只要唤起深层记忆,衡山望峰话的语音系统、文白异读的情况在脑海里还是很清晰的。加上三次衡山方言调查资料、特别是两种望峰话调查资料的参照,在探讨望峰音系的发展变化中,对照同音字表,从系统性来观察、比较,情况就都摆得很明白,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第三类是《汉语史论集》(增补本)出版后我所写的汉语史方面的文章 15 篇。这些文章大都是为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而撰写的。前 8 篇大多涉及古音问题,直接与本世纪初的古音研究十年论争有关的就有 5 篇。《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是论争后期对靠双语词典搞汉藏语比较来构拟上古音的国内外“古音学家”,作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一击。《从湘方言的“盖”和“𪔐”谈到对古代语言学

文献的正确释读》《“美”字能归入微部吗》和《谈谈古音研究的十年论争》等4篇是对潘悟云、郑张尚芳、冯蒸等的剖析。后5篇是讨论词义、训诂问题,有的是对古典诗词的流行释读作出批评,有的是对历史词典的修订方案提供建议。

第四类有5篇是论述王力先生的学术道路和学术贡献,另外6篇是纪念、学习我的其他师辈的治学和为人。

第五类主要是应朋友之约,为他们的学术论著所写的序,也包括为个人主编的一部教材、两部论文集所写的自序,共计13篇。这些序短到八九百字,长不过两三千字,内容大多是探索著作的写作背景、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都只表示我个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或评价。

总之,《论集》配上《存稿》反映了我六十年来学术研究各个方面的大致情况。80年代以前我的精力有一多半是用在《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上,我对教材当然是重视的;但是《古代汉语》教材是集体著作,我只宜把我执笔的个别篇目选入《存稿》,作个交代。

有人贬低教材,那是很不妥当的。王力先生的几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国音韵学》(后改名《汉语音韵学》)、《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汉语史稿》,还有《汉语诗律学》《中国语言学史》不也都是先生的讲稿、教材吗?当然有的人写教材不下功夫,东拼西凑,那是另一回事。比如,70年代我主持编写的《古代汉语》中册,有位先生分工执笔写三节古代文化常识、一节古汉语今译,我不便轻易否定或大肆删改,结果三节文化常识被出版社退稿,只得由我重写两节,由蒋绍愚重写一节。《古汉语今译问题》一节也不很允当,因此修订版也换了收在《存稿》中由我重写的这篇。

我主持编写的《古代汉语》教材,常识部分比较强调系统性和知识的前瞻性,得到学术界的肯定。上、中两册的稿子,至少也是

三易其稿;不少章节包含执笔者的研究心得或某些新观点。例如,“被”字句的问题,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册(科学出版社1958)第48节《被动式的发展》中说:“带关系语(施事者)的‘被’字句在第四、五世纪之间产生了。”并举了《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各两例(中册427页)。《古代汉语》上册(北京出版社1981)常识第8节《古代汉语的被动表示法》却说(300页):“‘被’开始用于被动句式时,只直接加在动词前面,到汉末才出现由‘被’引进行为主动者的句式。例如,蔡邕《被收时表》:‘今月十三日,臣被尚书召问。’”这里就没有照抄《史稿》。

《汉语史稿》1980年由中华书局用科学出版社的原纸型重印一次,没有改动。唐钰明《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唐至清的“被”字句》查考了大量典籍,参考了《汉语史稿》1980年本,他在后一篇文章中说(《唐钰明自选集》28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略论》以及本文附表的数据作统计,‘被’字乙式(按:即带关系语)在‘被’字句中的频度分别为:先秦两汉,0%;六朝,7%;唐宋,82%;元明清,83%。”这说明唐文所作考察只停留在《史稿》原来的结论(东汉以前“被”字句不带关系语)。我在编辑《王力文集》第九卷《汉语史稿》时,是采用中华书局1982年的加印本作为底本,却发现王先生在这里采纳了《古代汉语》的意见,为此作了挖改,改为(参见1982年中华书局加印本及《王力文集》第九卷558页):“带关系语(施事者)的‘被’字句在汉末已经有了萌芽,如蔡邕《被收时表》……到了第四、五世纪就更多一些。”这说明古代汉语常识的编写,不但根据教学的需要认真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还重视前瞻性的发掘,不放弃个人的研究心得。在八节有关语法的常识中,大多带有我研究汉语语法史的某些认识和看法。比如,判断句中的系词“是”、第三人称代词的产生、指示代词的体系、句尾语气词的作用等,都没有遵循当时的主流看法,不过那些问题我都写有论

文,见《汉语史论集》(增补本)。这里“被”字句带关系位,只是发现了早一两百年的用例,值不得另写文章,就写进了教材。

《存稿》的内容涉及汉语研究领域的范围广,写作时间差异巨大;各篇文章之间,体例不一,繁简的要求也有不同,拼音和国际音标还时有交错。我们对这些方面不作统一,一般仍旧,请读者见谅。最后要感谢秦淑华编审通读全稿,认真校勘,为作者考虑多,想方设法,保证出版高质量。

2014年6月16日于燕园

目 录

序 言	1
駢體文的構成(上)	1
駢體文的構成(下)	8
古漢語今譯問題	18
同義詞辨析十五例	34
谈谈怎样学习古代汉语	51
谈谈古代汉语的语法教学	57
要学会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	63
怎样掌握近体诗的格律	68
漫谈同义词的辨析	76
讲词类活用的两要	82
参编《古代汉语》的体会	88
漫谈汉语研究生的培养	93
南岳话的词汇、语法特点综述	107
南岳方言的语音系统及其来源	120
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衡山音系读后	147
有关湖南方言调查的一些想法	160
衡山望峰话音系	165
《王力古汉语字典》音读校勘记	231

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	249
也谈语法化	268
从湘方言的“盖”和“𪛗”谈到对古代语言学文献的正确释读	278
“美”字能归入微部吗？ ——与梅祖麟商榷	288
再谈“美”字能归入微部吗？ ——与郑张尚芳商榷	295
谈谈《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流行释读和评述	306
谈谈古音研究的十年论争	315
汉语史的分期问题	324
也谈古汉语复辅音问题	334
上古闭口韵的分部问题	350
再谈《鸟鸣涧》的释读问题 ——答蔡义江《新解难自圆其说》	364
《辞源》修订方案(讨论稿)读后	384
在《汉语大词典》编纂修订方案讨论会上的发言	390
对《汉语大词典》修订稿的意见	395
王力先生的学术道路	405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方面的贡献 ——重读《汉语史稿》	417
王力先生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426
中国语言学现代化的一代宗师 ——王力先生	441
王力先生与周扬的一段交往	458

学习杨晦先生坚持原则的精神

——杨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发言 462

回忆叶圣陶先生对《古代汉语》的审阅 465

我的第一个学术领路人 468

重温吕先生“处理好四个关系”的教诲

——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472

做了周先生的助教以后

——庆祝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感言 480

忆石波师 483

《古代漢語》序 488

《史记索引》序 490

《古汉语语法论集》前言 492

《〈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序 495

《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序 497

《古代漢語專書語法研究》序 500

《〈左传〉谓语动词研究》序 504

《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序 508

《严子琪篆刻集》序 512

《〈马氏文通〉研究》序 514

《出土战国文献语法研究》序 517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序 520

《静霞轩诗词集》序 523

附 录

传承薪火，砥柱中流

——中文系郭锡良教授访谈录 526

駢體文的構成(上)

駢體文是漢以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文體。劉勰的《文心雕龍》以爲從司馬相如、揚雄以後就有了駢體文，清代李兆洛的《駢體文鈔》把賈誼《過秦論》、司馬遷《報任安書》、揚雄《解嘲》等都收錄進去。的確，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文章是用了許多平行的句子，東漢班固、蔡邕等人的文章更講求句法的整齊，可以認爲是駢體文的先河。但是上述諸家作品裏的平行句法，只是爲了修辭的需要，還沒有形成固定的格式，不能算作一種文體。明代王志堅在《四六法海·序》中說，駢體文從魏晉才開始形成，這是有道理的。南北朝是駢體文的全盛時代，這時候，駢體文成爲文章的正宗。唐宋以後，駢體文的正統地位被“古文”代替了，但是仍舊有人寫駢體文。

駢體文的表達方式與一般的散文有所不同。我們要培養閱讀古書的能力，不能不了解駢體文，否則有些用駢體文寫的名著就不能徹底讀懂。在這兩節通論裏，我們從語言的角度來說明駢體文的構成，以便讀者對駢體文的語言特點有個基本的了解。

駢體文的語言有三方面的特點：第一是語句方面的特點，即駢偶和“四六”；第二是語音方面的特點，即平仄相對；第三是用詞方面的特點，即用典和藻飾。

先談駢偶問題。

兩馬並駕叫做駢，兩人在一起叫做偶。駢偶就是兩兩相對。古代宮中衛隊的行列叫仗（儀仗），儀仗是兩兩相對的，所以駢偶又叫對仗。駢偶、對仗都是比喻的說法。駢體文一般是用平行的

兩句話，兩兩配對，直到篇末。下面舉一些駢偶的例子：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宋書·謝靈運傳·論》）

高峰入雲，清流見底。（陶弘景《答謝中書書》）

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文心雕龍·情采》）

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庾信《哀江南賦序》）

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王勃《滕王閣序》）

偶然也有兩個以上的意思平列的，那只算是特殊的情況：

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文心雕龍·情采》）

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文心雕龍·鎔裁》）

駢偶（對仗）的基本要求是句法結構的相互對稱：主謂結構對主謂結構，動賓結構對動賓結構，偏正結構對偏正結構，複句對複句。古代雖沒有這些語法術語，但事實上是這樣做的。現在各舉一些例子如下：

（1）主謂結構對主謂結構

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宋書·謝靈運傳·論》）

幽岫含雲，深谿蓄翠。（吳均《與顧章書》）

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文心雕龍·情采》）

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庾信《哀江南賦序》）

（2）動賓結構對動賓結構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宋書·謝靈運傳·論》）
 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文心雕龍·情采》）
 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庾信《哀江南賦序》）
 披繡闥，俯雕甍。（王勃《滕王閣序》）

(3) 偏正結構對偏正結構

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宋書·謝靈運傳·論》）
 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蕭統《文選·序》）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庾信《哀江南賦序》）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王勃《滕王閣序》）

(4) 複句對複句

蟬吟鶴唳，水響猿啼。（吳均《與顧章書》）
 水性虛而淪漪結，木質實而花萼振。（《文心雕龍·情采》）
 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蕭統《文選·序》）
 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王勃《滕王閣序》）

如果進一步分析，駢偶不僅要求整體對稱，而且上下聯內部的句法結構也要求一致：主語對主語，謂語對謂語，賓語對賓語，補語對補語，定語對定語，狀語對狀語。例如：

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吳均《與顧章書》）
 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文心雕龍·情采》）
 規範本體謂之鎔，剪裁浮辭謂之裁。（《文心雕龍·鎔裁》）
 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蕭統《文選·序》）

例一“森壁”對“孤峰”是主語對主語，“爭霞”對“限日”是謂語對謂語；在主語中“森”對“孤”是定語對定語，在謂語中“霞”對“日”是賓語對賓語。例二“綜”對“敷”是狀語對狀語。例三“規範本

體”對“剪截浮辭”都是用動賓結構作主語。例四“荀宋”對“賈馬”是主語對主語，“表之於前”對“繼之於末”是謂語對謂語；在謂語中“於前”對“於末”是補語對補語。總之，各例的內部結構是完全一致的。內部結構參差不齊的，並不常見：

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吳均《與顧章書》）

至於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文心雕龍·鎔裁》）

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庾信《哀江南賦序》）

懷帝聞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王勃《滕王閣序》）

以上例句，上下聯在句法結構方面都有些差異，似乎是半對半不對，但總的看來，仍然是對稱的。比如例一“於斯已辦”和“豈徒語哉”，內部結構雖然不同，但都是充當謂語，上下聯仍是主語對主語，謂語對謂語。最後一例“而不見”和“以何年”的語法結構差別較大，但上下聯都是省去了主語，整個來說，還是謂語對謂語。

駢偶注意句子結構的對稱，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就是注意詞語的相互配對。原則上總是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形容詞對形容詞，副詞對副詞，連詞、介詞也與連詞、介詞相對。凡用作主語、賓語的，一律看成名詞（“幽岫含雲，深谿蓄翠”）。用作定語的，除“之”字隔開的名詞外，名詞和形容詞被看成一類，相互配對（“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用作狀語的，一般都看成副詞（“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物”）。用作敘述句謂語中心詞的，一般都看成動詞（“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如果後面不帶賓語，那麼，動詞和形容詞（作謂語的形容詞）被認為同屬一類，相為對仗（“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一般是異字相對；連詞、介詞大多是同字相對，但也有異字相

對的。上文所舉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些情況，這裏不再討論。

有一點值得提一提，駢偶在句法結構、詞性相互配對的原則下，上下聯的字數自必相等。但是句首句尾的虛詞以及共有的句子成分(主語、動詞、助動詞等)不算在對仗之內。例如：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宋書·謝靈運傳·論》)

夫能設謨以位理，擬地以置心。(《文心雕龍·情采》)

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文心雕龍·鎔裁》)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蕭統《文選·序》)

駢偶在達到上面所說的基本要求以後，進一步要求對仗工整。作者不以句法結構和詞性相對為滿足，還要求分別“事類”。這就是說，要求把相近的概念作為對仗。例如《哀江南賦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潘岳”對“陸機”，是人名對人名；“始述”對“先陳”，一字扣一字；“家風”對“世德”，“文采”對“辭賦”，也是同類概念相對。現在再舉一些對仗工整的例子：

律異班賈，體變曹王。(《宋書·謝靈運傳·論》)

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沈鱗競躍。(陶弘景《答謝中書書》)

思瞻者善敷，才覈者善刪。(《文心雕龍·鎔裁》)

歷觀文囿，泛覽辭林。(蕭統《文選·序》)

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王勃《滕王閣序》)

當然，過於要求工整，就會弄到用同義詞配對(以“異”對“變”，以“將”對“欲”，以“觀”對“覽”)。同義詞用得太多，就顯得重複，是駢體文的毛病。《文選·序》“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就是上下聯意思雷同的例子。與同義詞配對相反，用反義詞配對，內容既